

如何实现居民收入增长？

张车伟 赵文*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且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这使得实现到2020年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成为一项艰巨任务。本文在分析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梳理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特征，探讨了制约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增加居民收入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目标需要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健全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还要改革资本市场，畅通资本收益转化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通道。

关键词 居民收入份额 经济增长 劳动报酬 滞后期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照此计算，2015-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不能低于6.6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速不能低于5.24%，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不能低于5.81%，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不能低于6.63%。现在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轻松的任务。2011-2014年，虽然总体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较快，但自2012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双双下滑，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只有6.8%，是十几年来最低点。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果居民收入增速仍像过去那样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那么，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如何确保在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下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是当前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居民收入增长并非越快越好，而是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较快的居民收入

*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zhangjw@cass.org.cn；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zhaowen@cass.org.cn。

增长如果没有相应经济增长的支撑,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初期,中国就曾经出现过工资侵蚀利润的问题。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认为,价格双轨制以及国有企业享受的预算软约束使得收入分配过多向劳动倾斜,国企职工的工资性收入过快增长严重侵蚀利润,从而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企业成长遇到很大困难。这实际上也是后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短期内可以起到增加企业储蓄、提高投资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将造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不利于内需培育和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因此,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同步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速,使得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对于这一问题,田卫民(2008)使用生产函数发现,1978-2006年实际居民收入份额过低。王旭明(2012)认为,这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结果。本文梳理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的特征,并建立了一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并提出增加居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的基本状况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居民收入是分城乡来计算的,其中城镇居民统计其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统计其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减去交纳个人所得税和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则是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减去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赠送农村内部亲友支出后的收入。虽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统计略有差异,但从收入来源来看都包括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自2012年第4季度开始,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统一了城乡居民收入名称、分类和统计标准,在全国抽选了16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直接开展调查。在此基础上,计算了不分城乡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国家统计局为保持年度可比,继续公布分城乡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

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不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12年以后的数据,而我们在研究居民收入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到较长时间的数据,所以,这里有必要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照城乡常住人口数量加权,得到一个可以近似代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表1)。就2012-2014年的情

况来看，我们加权得到的全国居民收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不分城乡统计数据之间差异非常小，这说明我们使用加权方法计算得到的居民收入数据基本可以代表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真实状况。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居民收入均指居民可支配收入。

表 1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年份	统计局公布数据	加权数据	年份	统计局公布数据	加权数据
1991	—	976	2003	—	4993
1992	—	1125	2004	—	5645
1993	—	1385	2005	—	6367
1994	—	1870	2006	—	7211
1995	—	2363	2007	—	8567
1996	—	2814	2008	—	9939
1997	—	3070	2009	—	10965
1998	—	3250	2010	—	12508
1999	—	3478	2011	—	14582
2000	—	3712	2012	16511	16669
2001	—	4059	2013	18311	18599
2002	—	4519	2014	20167	20542

注：“统计局公布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权数据”是本文按照城乡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加权计算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从中国过去 30 年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往往快于居民收入增长，而且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滞后性尤为明显，转移性收入占比大，财产性收入占比小。如图 1 所示，1978 - 2014 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速达到了 8.5%。然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并没有跑赢 GDP 的增长。1978 - 2014 年，GDP 年均增速达到了 9.7%，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1 个百分点。

分时期来看也是如此。如表 2 所示，“八五”（1991 - 1995 年）、“九五”（1996 - 2000 年）、“十五”（2001 - 2005 年）和“十一五”（2006 - 2010 年）期间，居民收入增速分别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5.3、0.8、1.9 和 2.4 个百分点。分城乡来看，1978 - 2014 年的 37 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的有 10 个年份，低于 GDP 增速的有 27 个年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的有 10 个年份，低于 GDP 增速的有 27 个年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从 1991 年开始连续 19 年低于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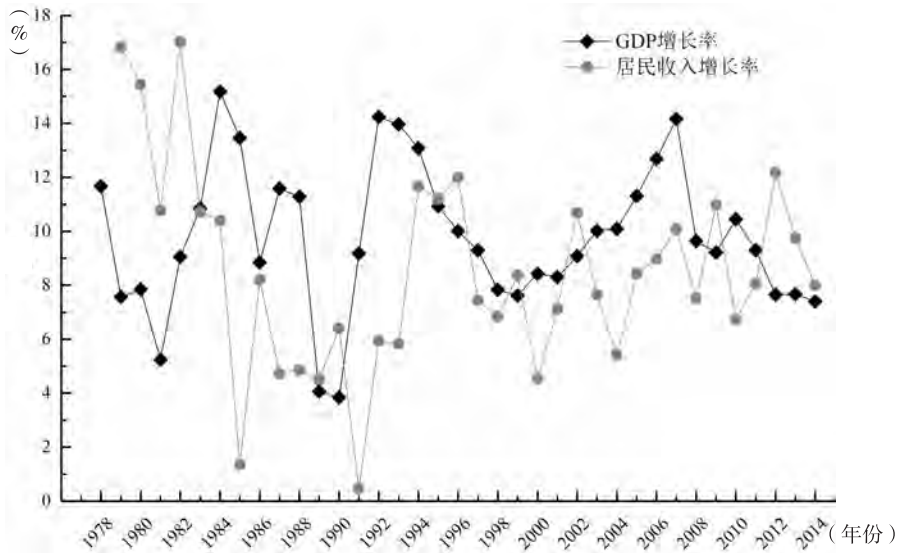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 GDP 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增速，使得农村居民生活改善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于2009年达到最高的3.333: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来，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014年的2.75:1，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得益于此，全国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增速首次连续3年超过了经济增速。

表2 GDP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

单位：%

年份	GDP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GDP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GDP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GDP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1	9.2	7.2	2.0	0.5	2.0	7.2	8.7	5.3
1992	14.2	9.7	5.9	5.9	4.6	8.3	8.3	
1993	14.0	9.5	3.2	5.8	4.4	10.8	8.1	
1994	13.1	8.5	5.0	11.7	4.6	8.1	1.4	
1995	10.9	4.9	5.3	11.2	6.0	5.6	-0.3	0.8
1996	10.0	3.9	9.0	12.0	6.1	1.0	-2.0	
1997	9.3	3.4	4.6	7.4	5.9	4.7	1.9	
1998	7.8	5.8	4.3	6.8	2.1	3.5	1.0	
1999	7.6	9.3	3.8	8.4	-1.7	3.8	-0.7	
2000	8.4	6.4	2.1	4.5	2.0	6.3	3.9	

续表

年份	GDP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GDP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GDP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GDP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1	8.3	8.5	4.2	7.1	-0.2	4.1	1.2	1.9
2002	9.1	13.4	4.8	10.7	-4.3	4.3	-1.6	
2003	10.0	9.0	4.3	7.6	1.0	5.7	2.4	
2004	10.1	7.7	6.8	5.4	2.4	3.3	4.7	
2005	11.3	9.6	6.2	8.4	1.7	5.1	2.9	
2006	12.7	10.4	7.4	9.0	2.3	5.3	3.7	2.4
2007	14.2	12.2	9.5	10.1	2.0	4.7	4.1	
2008	9.6	8.4	8.0	7.5	1.2	1.6	2.1	
2009	9.2	9.8	8.5	11.0	-0.6	0.7	-1.8	
2010	10.4	7.8	10.9	6.7	2.7	-0.5	3.7	-1.1
2011	9.3	8.4	11.4	8.1	0.9	-2.1	1.2	
2012	7.7	9.6	10.7	12.2	-1.9	-3.0	-4.5	
2013	7.7	7.0	9.3	8.1	0.7	-1.6	-0.4	
2014	7.4	6.8	9.2	8.0	0.6	-1.8	-0.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虽然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解释，但经济发展规划中居民收入增长目标落后于经济增长目标也许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例如，“八五”（1991 - 1995年）规划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年均6%，职工工资每年递增2%，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递增3.5%；“十五”（2001 - 2005年）规划提出，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7%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十一五”（2006 - 2010年）规划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5%；“十二五”（2011 - 2015年）规划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从规划目标可以发现，除了“十二五”以外，居民收入的增速目标都低于经济增速目标。

从结果来看，实际经济增长率往往大幅度高于规划目标，而居民收入增长虽然也高于规划目标，但仍然大幅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参见表3），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显得更加缓慢。例如，“十一五”期间，GDP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1.2%，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只有9.7%，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只有8.9%。在“十五”期间，尽管实现经济增长率年均9.5%，超过了目标增长率2.5个百分点，但是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只超过目标增长率0.3个百分点，增长率仅为5.3%。

表3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规划目标与实现情况

单位：%

	“十五”：2001 - 2005 年		“十一五”：2006 - 2010 年		“十二五”：2011 - 2014 年	
	规划目标	实现情况	规划目标	实现情况	规划目标	实现情况
GDP	7.0	9.5	7.5	11.2	7.0	8.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	9.6	5.0	9.7	7.0	7.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0	5.3	5.0	8.9	7.0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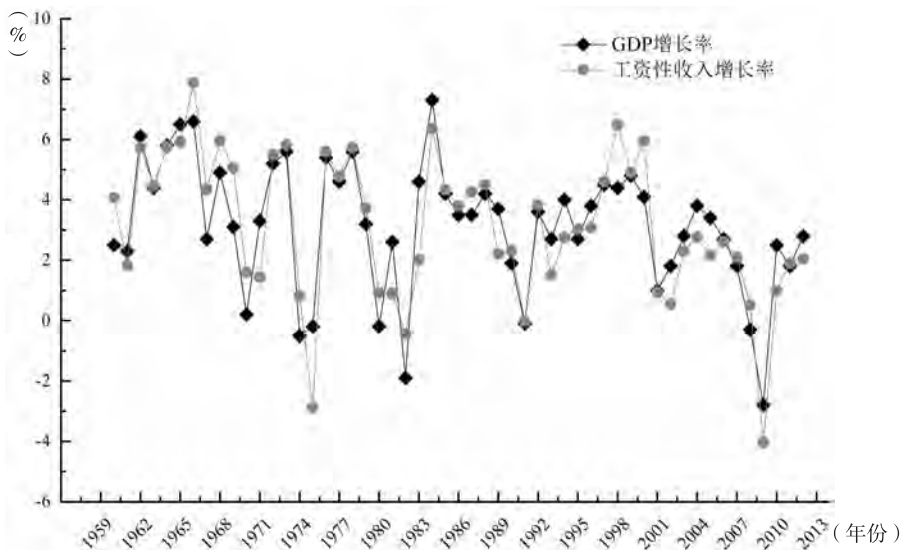
注：表内数字为规划期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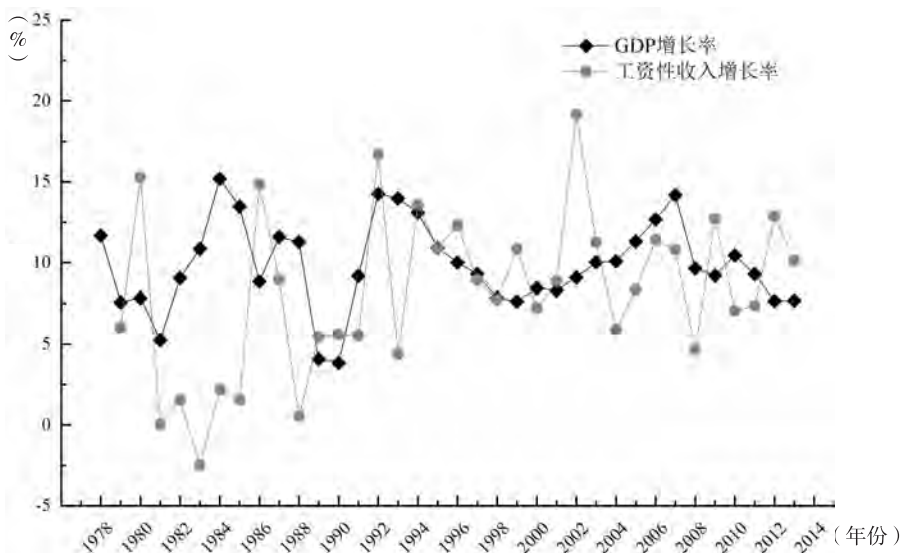
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滞后性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不断发育，但工资调整机制还不完善，工资刚性使得工资水平难以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调整。这就使得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尽管各类单位机构的盈利非常有限，但仍然要支付相对固定数额的工资，工资相对于企业经营收入的比重就会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率相应提高。而在经济景气年份，尽管企业利润很高，但并不会立即提高工资水平，工资相对于企业经营收入的比重就会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率相应下降。因此，短期的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工资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市场缺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手段，例如在工资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劳动者缺乏增加工资的筹码，无力和资本博弈，其结果是当经济超额增长时，收益更多地转化为资本收益。

不过，在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的情况下，工资增长是可以和经济增长保持较好的同步性的，从而使居民收入增长滞后的现象大大减少。例如，美国的工资性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就保持了较好的同步性，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如图2所示）。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越灵活，劳动要素越能够按照边际生产力获得市场报酬，工资粘性会大大降低，市场也会越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有待完善，尤其是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还有待健全。

此外，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还与居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大，而财产性收入占比较小有关。以自雇就业为主要形式的城乡个体经济和农业经济所产生的经营性收入，是中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经营性收入的特点是增长较为稳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在发达国家，经营性收入占比较低，因此受经济周期



(a) 美国



(b) 中国

图2 工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中美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的影响较大。中国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来自农业的部分长期占到 50% 以上，最近两年才降低到 41%，因此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小，这加大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性。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国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对弱势群体的倾斜，避免经济波动对居民收入产生过大的影响。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能够起到对经济波动的抵消作用。例如，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2007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5%，而转移性收入增速从2008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19%。美国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比长期在13%以下，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逐步上升到目前的16%~17%的水平；日本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比长期在7%以下。中国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比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从1992年的9%上升到2005年的18%，进一步上升到2013年的22%，年均增速达到了13.4%，增速远远超过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图3）。转移性收入占比大的特点加大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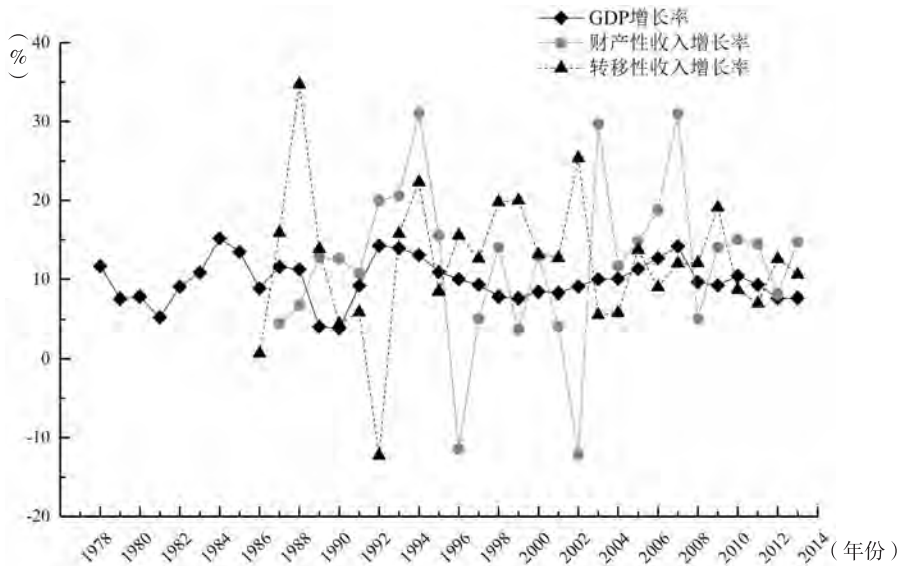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GDP增长、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于动产和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是对经济变化响应最快的收入形式。从财产性收入的角度看，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居民通过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有限，这使得财产性收入对经济变化响应快的特点难以发挥更大、更明显的作用。在GDP增长中，资本要素收益占比高，这部分收入只有很小一部分能转变为居民收入，而且还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如股市、债券市场和银行利息的方式，资本市场的完善使得初次分配的高资本收益率在转变为

居民收入时大大缩水，减缓了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

综合城乡居民的收入来看，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8310.8元（图4）。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57%，经营性收入占比为19%，财产性收入占比为8%，转移性收入占比为16%。总体来看，中国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周期，经营性收入主要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财产性收入受重大经济事件影响较大，转移性收入呈现出滞后期波动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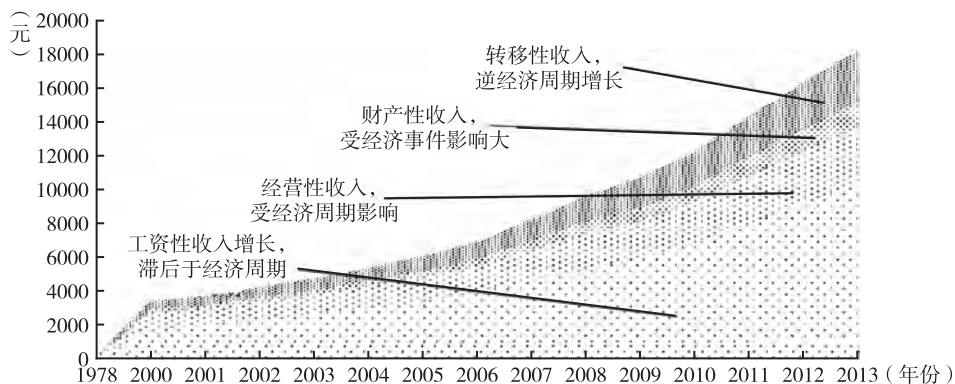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的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二 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的特征及其解释

（一）居民收入增长的两个基本特征

通过对比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我们归纳总结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个带有规律性的特征性事实：一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期”现象，居民收入增长往往滞后于经济增长2~3年左右；二是居民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

首先来看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期”现象，即居民收入增速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变化。如果将居民收入增长曲线提前2年，则会呈现出图5的结果。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变化与经济增长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性。在经济增速下行的1989-1990年、1993-2000年，居民收入增速在2~3年后也随之下行；在经济增速上行的2001-2007年，居民收入增速上行出现在2004-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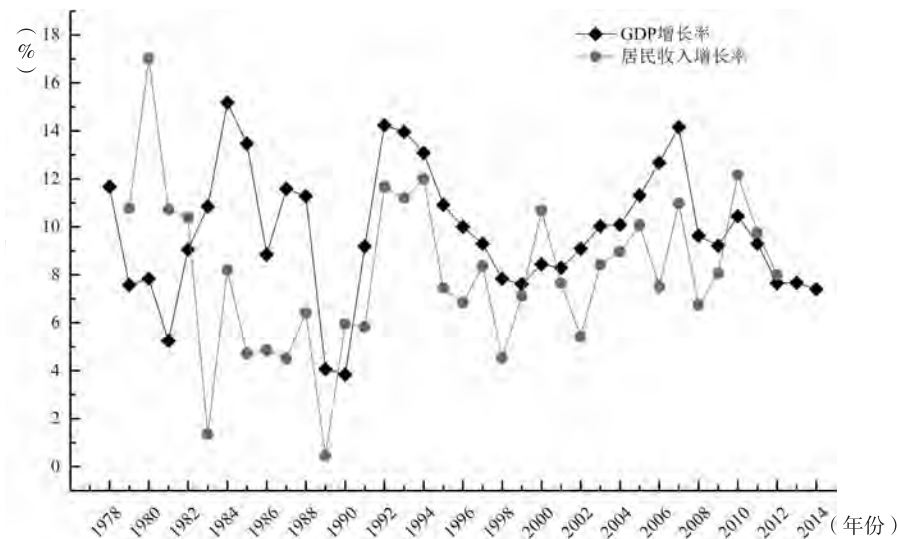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 GDP 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

注：灰线是将居民收入增长曲线提前2年的结果。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对经济变化的响应具有2~3年的滞后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从季度数据看，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期”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如图6所示，经济增速在2007年第4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从14.2%下降到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2009年第4季度到2011年第1季度从9.8%下降到6.7%，城镇居民收入变化滞后经济变化8个季度；经济增速在2009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从6.6%上升到12.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2011年第1季度到2012年第1季度从6.7%上升到11%，城镇居民收入变化滞后经济变化也是8个季度。这一现象在2010年第1季度到2012年第3季度又经历了一个周期，并且延续至今，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随着2年前的经济走势下降。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和经济走势的关系与城镇居民类似，只是滞后期约为4个季度。联系图5中全国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期”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反复出现。

居民收入增长的这种“滞后期”现象反映了生产要素分享经济增长收益的机制不同，尤其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密切相关。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工资具有较强的刚性，那么，工资就难以及时随经济波动而调整，其结果是当经济增长超过预期时，由于工资无法实现和经济增长相同幅度的增长，经济增长加速的收益短期会更多地转化为资本收益，在之后的时期慢慢调整到正常水平；相反，当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时，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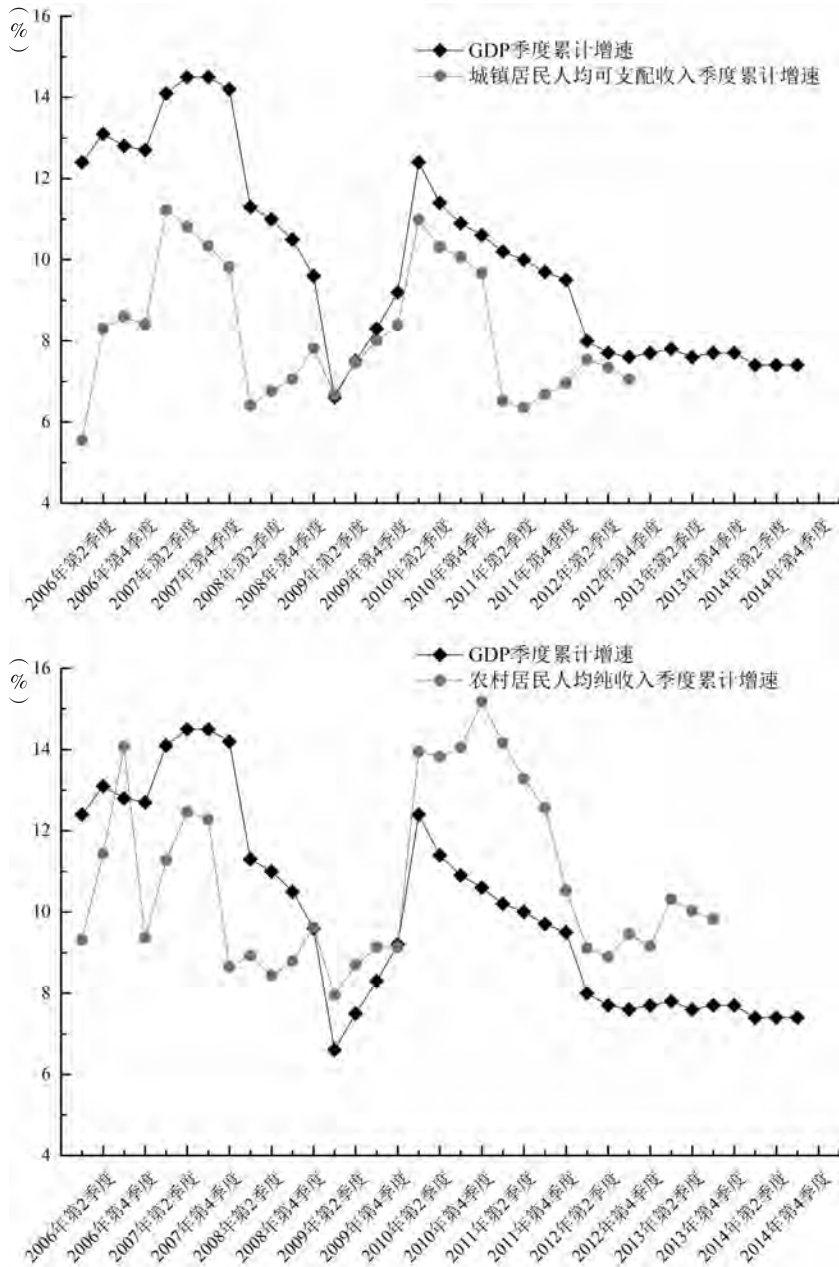


图6 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滞后期

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季度累计增速曲线的位置提前了8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季度累计增速曲线的位置提前了4个季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数据计算得到。

工资无法快速下降，经济增长减速的成本将会更多地为资本所承担，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居民收入就会落后于经济形势变化。由于劳动报酬占居民收入比重大大超过资本（财产性）收入，所以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居民收入增长就显得偏慢，而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居民收入增长反而显得较快，“滞后期”现象由此产生。

居民收入增长的第二个特征性事实是居民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的 U 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改革早期的居民收入份额较高，而经济增长速度较低。随着改革推进，经济增速超越了居民收入增速，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尽管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出口，但却同时造成了国内产能过剩，消费需求被抑制，环境代价极大，国际收支失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势必要求居民收入份额提高。按照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将各省市的居民收入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按照最低程度推算得到了 2014 - 2020 年的数据。综合两者可以发现，居民收入份额与人均 GDP 呈现较为明显的 U 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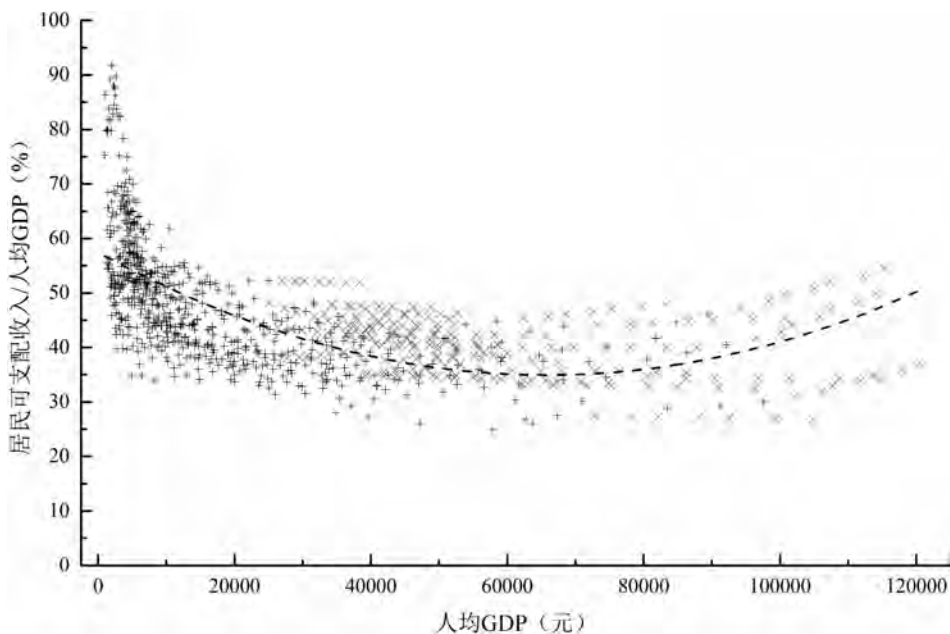


图7 居民收入份额与人均 GDP 的 U 型关系

资料来源：“+”代表的来自《中国统计年鉴》，“x”代表的未来经济变化的模拟。

（二）为什么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1. GDP 构成与居民收入构成的差异

从根本上来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源于 GDP 构成和居民收入构成之间存在差异。在收入法 GDP 核算中，GDP 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劳动报酬、企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其中企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可归入资本收入，而间接税属于政府收入。居民收入则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GDP 和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GDP 中劳动报酬收入对应着居民收入中的劳动报酬收入，GDP 的资本收入对应着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GDP 的间接税则对应着居民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关于居民收入中的“经营性收入”，也许需要稍微做一些解释。在国民收入核算中，个体经济或者说是自雇经济部门产生的增加值，由于很难区分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因此一般被称之为“混合性收入”。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 GDP 核算中往往把这部分收入单独列示为“混合收入”，而中国收入法 GDP 核算中则把这部分收入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拆分到了相对应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中。因此，居民部门的经营性收入所对应的就是 GDP 核算中的“混合性收入”。根据我们的计算，2013 年，中国自雇部门或者说个体经济部门创造 GDP 占全部 GDP 的比重为 20%。图 8 显示了 GDP 核算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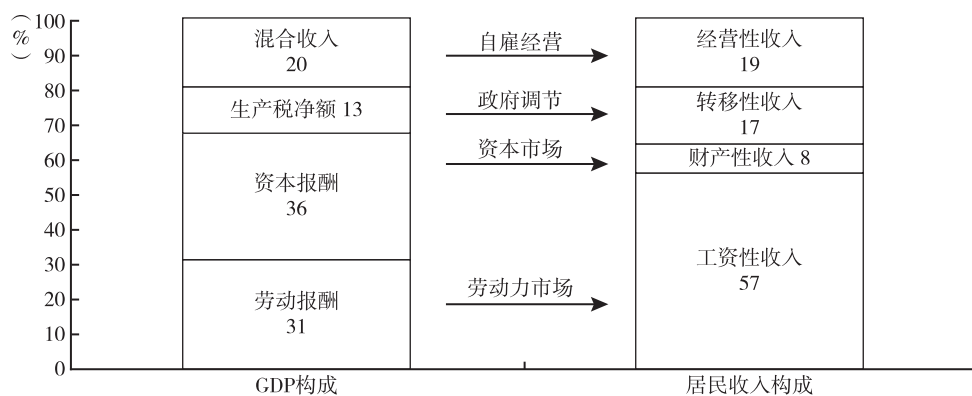


图 8 GDP 核算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计算得到。

由于 GDP 构成与居民收入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要保持同步实际上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中国目前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约占 31%，资本报酬约占 36%，间接税约占 13%，混合经济成分约占 20%。而在居民

收入中,主要是劳动报酬收入,劳动报酬占城镇居民收入比重约在70%~80%,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也在50%左右,而且劳动报酬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高的资本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很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都很小。同时,居民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并不通畅,这使得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资本报酬难以转化为居民收入。从图8可以看出,资本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6%,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居民收入的8%左右。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长期过低的格局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

居民收入中的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也很难和经济增长同步。居民经营性收入主要来自城乡个体户收入和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幅度较低,且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例如在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营性收入出现了连续四年的增长率下滑。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又出现了连续8年增长率提高。近年来,受到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影响,经营性收入出现了连续的增长率下滑。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转移性收入主要是国家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对弱势群体的倾斜,避免经济波动对居民收入产生过大的影响。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能够起到对经济波动的抵消作用,但与经济增长并不同步。例如,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2007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5%,而转移性收入增速从2008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19%。

2.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长

中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计算中国1992年以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表4)。从初次分配来看,1992-2008年间,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都呈现上升趋势,企业收入从17.37%上升到25.26%,上升了7.89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则从16.57%上升到17.52%,上升接近1个百分点,而居民部门收入则大幅度下降,由66.06%下降到57.23%,下降了8.83个百分点。初次分配阶段居民收入的下降主要由企业部门份额的上升所解释。

再分配后,国有收入的分配格局仍然表现为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上升以及居民部门收入的下降。1992-2008年,企业部门份额从11.70%上升到21.60%,

上升了 9.9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从 19.96% 上升到 21.28%，上升了 1.32 个百分点，居民部门则从 68.34% 下降到 57.11%，下降了 11.23 个百分点。与初次分配格局相比，再分配使得企业部门收入下降，政府部门收入上升，居民部门收入略有波动。以 2012 年为例，与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中企业部门收入下降了 4.24 个百分点，居民部门上升了 0.37 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则上升了 3.91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通过再分配得到了更高的收入份额。

表 4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单位：%

年份	初次分配			再分配			初次分配 - 再分配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居民部门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居民部门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居民部门
1992	17.37	16.57	66.06	11.70	19.96	68.34	-5.67	3.39	2.28
1993	20.10	17.29	62.61	15.73	19.65	64.62	-4.37	2.36	2.01
1994	17.77	17.08	65.15	14.53	18.51	66.96	-3.25	1.43	1.82
1995	19.53	15.22	65.25	16.22	16.55	67.23	-3.31	1.33	1.98
1996	16.90	16.62	66.48	13.69	17.88	68.44	-3.21	1.25	1.96
1997	16.90	17.08	66.02	13.10	18.30	68.60	-3.80	1.22	2.58
1998	16.19	17.74	66.06	13.45	18.13	68.41	-2.74	0.39	2.35
1999	17.81	17.15	65.05	14.70	18.10	67.20	-3.11	0.95	2.15
2000	18.96	17.65	63.39	16.60	19.20	64.20	-2.36	1.55	0.81
2001	20.19	18.50	61.31	17.50	20.50	62.00	-2.69	2.00	0.69
2002	20.32	19.14	60.54	18.00	21.00	61.00	-2.32	1.86	0.46
2003	20.93	19.37	59.70	18.20	22.00	59.80	-2.73	2.63	0.10
2004	25.99	16.34	57.68	23.27	18.90	57.83	-2.72	2.56	0.15
2005	23.19	17.45	59.37	20.76	20.04	59.20	-2.43	2.59	-0.16
2006	23.15	17.90	58.95	19.86	21.44	58.70	-3.29	3.55	-0.26
2007	23.57	18.30	58.13	20.22	21.94	57.84	-3.35	3.64	-0.29
2008	25.26	17.52	57.23	21.60	21.28	57.11	-3.65	3.77	-0.11
2009	24.69	14.55	60.59	21.29	18.36	60.81	-3.40	3.81	0.22
2010	24.40	14.93	60.24	21.24	18.46	60.55	-3.16	3.53	0.31
2011	23.72	15.23	60.09	19.90	19.07	60.40	-3.82	3.84	0.31
2012	22.67	15.59	61.50	18.43	19.50	61.87	-4.24	3.91	0.3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国民收入分配都表现为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向企业部门倾斜,企业部门的收入增加解释了居民收入下降的绝大部分。在再分配阶段,政府部门收入进一步上升,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居民部门微升。2004年之前,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在再分配阶段比初次分配阶段有所上升,2004年之后则表现为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2009年后又略有上升。以2012年为例,政府部门再分配阶段收入的上升主要由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做解释。因此,再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政府部门倾斜。

从初次分配来看,居民收入的下降主要是企业部门收入增加造成的,而从再分配阶段来看则是因为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结果。由于GDP构成与居民收入构成不同,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居民收入,从而造成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国民收入部门间的分配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增长(刘尚希,2012)。

三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总结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存在一个动态的最优比率,居民收入份额随经济增长呈现一个U型走势。在经济起飞阶段,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将会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同时拉低经济增速。而居民收入增速缓慢,有助于积累率-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助推经济增长。经过了一个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瓶颈从供给转为需求,居民收入份额的提高将有助于消费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增速。因此,在相应的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居民收入份额,将有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居民收入份额的U型走势,主要体现的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积累-消费关系。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产出可以用于积累和消费两个方面,而积累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长期的人均消费最大化,那么根据Phelps(1961)关于黄金分割率的研究,人均资本量的选择应该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人口的增长率 n 。如图9所示,在一个边际产出递减的生产函数 $y=f(k)$ 中, k 是人均资本, nk 代表资本广化。当人均资本量处于C点的水平上时,人均产出 y 中能够用于消费的部分 $C-C_1$ 最大。这意味着,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存在一个动态最优值。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由于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企业收入主要用于投资,因此借鉴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模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居民收入份额为自变量的

计量模型，分析居民收入份额最优值的存在性，以此来分析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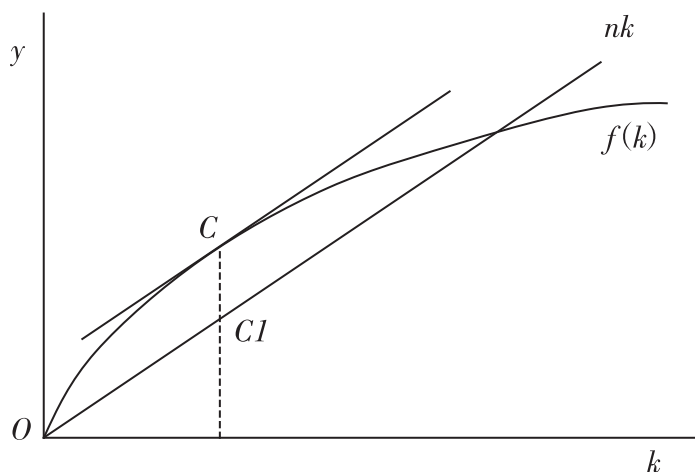


图9 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

如果经济增长中存在一个合适的居民收入份额，那么，越靠近这个份额，经济增长应该越快。居民收入份额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率。我们定义一个居民收入份额选择指数（ ICI ）和最优居民收入份额选择指数（ ICI^* ），那么，偏离最优居民收入份额选择指数可以表示为 $ICI - ICI^*$ ，这一数值越接近于0，说明当下的居民收入份额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进而，我们构造如下的计量方程：

$$G_i = \alpha_1 + \alpha_2 (ICI_i - ICI_i^*)^2 + \varphi X + u_i$$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 G_i 是1992-2013年期间各省市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如前所述，居民收入份额越接近于最优居民收入份额， $ICI - ICI^*$ 的数值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因此，预期 α_2 为负数。由于最优居民收入份额选择指数（ ICI^* ）是不可观察的，所以无法直接计算出 $ICI - ICI^*$ 的数值。不过， ICI^* 是一个大于0小于1的常数。在回归分析时，可以将上式展开为：

$$G_i = C + \alpha_2 ICI_i^2 + \alpha_3 ICI_i + \varphi X + u_i$$

其中， $C = \alpha_1 + \alpha_2 (ICI_i^*)^2$ ， $\alpha_3 = -2\alpha_2 ICI_i^*$ 。预期 α_2 为负数， α_3 为正数。

模型中的 X 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投资倾向越高的经济体，其稳态劳均产出就越高。因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投资导致高人均资本水平和高产出水平，而且，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企业部

门份额提高带来的,企业部门的收益增长主要用于投资,所以,我们引入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GDP的比率投资率(I_i)作为投资的代表变量。资本形成在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更长时期内,符合黄金分割率的投资率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有观点认为,长期来看,中国投资率偏高压抑了国内消费需求。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这个解释变量的当期系数符号应该为正,一个合适的滞后期的系数符号应该为负。

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引入了各个省区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以 LG_i 来代表)作为解释变量。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大量的经济增长收敛回归都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不过各个研究者实际使用的定义不一样。我们引入了各个省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年增长率(以 HG_i 来代表)作为解释变量。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

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能否适应产业升级的方向。中国从劳动力充裕资本相对稀缺,到资本充裕劳动力相对稀缺,是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以技术选择指数(TCI_i)来代表中国要素禀赋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TCI_{i,t} = \frac{(K/L)_{i,t}}{(K/L)_t}$,其中,全国平均的资本劳动比率是 $(K/L)_t$,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是 $(K/L)_{i,t}$ 。资本劳动比率越高,越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因此,预期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有关研究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往往能够带来新的技术诀窍和管理经验,即外溢效应。所以外国直接投资越多的地区,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就越大。我们在计量分析中实际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指标的定义是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GDP的比率(以 FDI_i 表示)。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代表了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还代表地区经济与外界的开放融合程度。我们预期外国直接投资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

城市化率($CITY_i$)能够反映经济要素的聚集程度,这一聚集过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所带来的配置效率。这种配置效率最终转化为经济要素聚集所带来的效率。城市化率越高的经济体,经济聚集效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因此,我们预期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表5报告了计量分析结果。居民收入份额选择指数(ICI)的二次项系数的符号为负,符合我们的预期,并且在每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检验。这说明,最优的居民收入份额是存在的。因此,居民收入份额的合理选择是具有经济增长含义的。从模型4和模型5来看,投资率(I)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对之后三期的经济增长影响为

负，说明过高的投资率能够刺激经济短期增长，但从长期增长来看，投资率过高了。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过低的居民收入份额，这压低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居民收入份额选择指数的一次项并不显著，不过系数符号符合预期。因为居民收入份额选择指数的一次项不显著，我们无法从公式 $\alpha_3 = -2\alpha_2 ICI_i^*$ 推算最优的居民收入份额。

其他的解释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技术选择指数、城市化率、劳动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的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但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符号的显著性不高。城市化率的符号为正，可能说明了经济要素聚集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已经大于城乡二元结构打破所带来的配置效率逐渐消失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增长率不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通过外部性来发挥，这一问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多有阐述，在此不作过多讨论。

表 5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数项	0.1043 (0.0004)***	0.0992 (0.0008)***	0.0997 (0.0005)***	0.1485 (0.0001)***	0.0771 (0.0393)**	0.1245 (0.0032)***
$ICI * ICI$	-0.2490 (0.0116)**	-0.2573 (0.0087)***	-0.2340 (0.0148)**	-0.2156 (0.0363)**	-0.2573 (0.0096)***	-0.2443 (0.0181)**
ICI	0.1272 (0.2455)	0.1395 (0.2001)	0.1150 (0.2811)	0.0394 (0.7389)	0.1582 (0.174)	0.0814 (0.4949)
LG		0.0955 (0.0367)**	0.1013 (0.0268)**	0.1222 (0.009)***	0.1020 (0.0258)**	0.1298 (0.0059)***
FDI			0.0019 (0.0131)**	0.0024 (0.0245)**	0.0019 (0.0132)**	0.0023 (0.0434)**
I					0.0163 (0.3402)	
$I(-3)$				-0.0452 (0.0186)**		-0.0496 (0.0125)**
TCI						0.0079 (0.0448)**
$CITY$						0.0175 (0.5641)
HG						0.0184 (0.4068)
调整的 R^2	0.3602	0.3637	0.3693	0.3474	0.3692	0.3496

注：括号内为 t 检验的 p 值。***、** 和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整理数据计算得到。

回归结果似乎支持了我们归纳的理论假说,即最优居民收入份额是存在的,在相应的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居民收入份额将有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从地区层面可以发现,尽管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份额仍处于下降区间,但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居民收入份额近十年来已经出现了稳定提高趋势。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会加大消费压力(刘铠豪、刘渝琳,2014),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通过劳动报酬的渠道增加消费动力(周明海,2014)。未来,居民收入U型走势将会更加明显。

当然,本文从总量层面得到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从结构层面分析。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收入均等化是有助于增加总量消费的。既然提高居民收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消费贡献和最大化居民福利,那么,实现这一目标就未必需要通过降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这一个办法。目前,工资性收入份额下降加大了规模性收入分配不平等(张车伟、赵文,2015),使得中国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81,两极分化严重。一些研究甚至认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61(甘犁,201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降低投资率之前,还有其他的增长潜力可供发掘。比如,有研究认为(许月丽等,2010),国有、外资、集体和个体与私人等形式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比率的变化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率的提高具有不同的影响,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费率。本文认为,提高居民收入,解决中国“高投资、低消费”增长模式问题,首先要从总量层面优化居民收入份额,然后,还可以从结构层面入手,对投资结构和收入分配加以优化调节,减小抑制投资带来的代价。

四 结论与对策建议

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如何实现到2020年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成为一项艰巨任务。完成这一宏图的关键在于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本文在分析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梳理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特征,探讨了制约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增加居民收入的对策建议。本文发现,居民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U型关系,因此,在适当的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能够提高经济增长中的消费贡献,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消费贡献低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势必要求居民收入份额提高。

长期来看，提高居民收入，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同时完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市场，改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建立居民收入合理增长和合理分配的长效机制。从初次分配来看，应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利用劳动力市场提高工资性收入，利用资本市场提高财产性收入，发展高效农业、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以增加经营性收入。从再分配来看，应该更加注重转移性支付的逆周期调节和缩小收入差距功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守住经济增长底线。从经验来看，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速有着相关性，经济增速下滑最终将带来居民收入增速的下滑。因此，必须要守住经济增长底线。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5-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6.6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5.24%，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5.81%，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应该不低于6.63%。

二是要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市场形势向着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应该不失时机地让作为市场主体的劳动者和企业自己去决定工资上涨的水平。同时，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破除资本市场垄断，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完善要素价格尤其是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改革已经成为形成公平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关键。

三是要确保工资合理增长。要调节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让各个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都能得到合理的利润水平，从而为工资上涨创造外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增强劳动者在工资决定中的话语权。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加强劳动监督力度，完善保障工资增长的三方协调机制。使用小时工资来规定最低工资，保护劳动者权益。实施月最低工资可能会增加企业滥用最低工资制度的动机，企业会要求雇员延长工作时间。使用小时工资计算的最低工资也有利于保护灵活就业者。

四是要扩大财产性收入占比，让居民分享资本收益。完善要素市场，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消除资本市场垄断和行政干预，破除对民间资本的歧视和壁垒，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消除非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完善城乡土地要素市场，理顺国有土地市场交易和收益分配机制，推进农村土地确权，

加快建立产权清晰、规范有序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形成公平合理的农村土地要素收益分配机制。

五是要发挥社会保障托底作用，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加强生活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统筹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发展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同时，也要注意使社会保障的标准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实行以保障基本生活为主的社会保障。

六是要鼓励创业，完善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多与要素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有关。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参与分配的机制还未理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的活力和社会的创造力。在全民创新、全民创业的大氛围中，要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分配政策，采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岗位分红权激励等多种方式，让大量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者得到应有的回报和激励。

参考文献：

- 戴园晨、黎汉明（1988），《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潜在危险》，《经济研究》第6期，第3-11页。
- 甘犁（2013），《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收入差距研究》，《经济资料译丛》第4期，第41-57页。
- 刘铠豪、刘渝琳（2014），《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来自人口结构变化的解释》，《劳动经济研究》第2期，第83-111页。
- 刘尚希（2012），《居民收入倍增主脉：重构国家、企业、居民关系》，《改革》第11期，第12-18页。
- 田卫民（2008），《基于1978-2006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居民收入份额研究》，《当代财经》第6期，第14-19页。
- 王旭明（2012），《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同步探源——以宁夏为例》，《调研世界》第9期，第16-19页。
- 许月丽、战明华、史晋川（2010），《消费决定与投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验及其含

义》，《世界经济》第5期，第118-139页。

张车伟、赵文（2015），《中国工资水平变化与增长问题——工资应该上涨吗？》，《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第3-14页。

周明海（2014），《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和机理研究》，《劳动经济研究》第3期，第77-99页。

Phelps, Edmund (1961).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 Fable for Growthme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4), 638-643.

How to Realize the Growth of Residents' Income?

Zhang Juwei & Zhao We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Chinese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lags behind the economic growth,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double income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2020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downward press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income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explores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ncrease residents' income.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U 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income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growth.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doubling residents' income, we need to hold the bottom line of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set up sound and reasonable wage growth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apital market and open more channels of capital gains into residents' property income.

Keywords: residents' income share, economic growth, labor income, lag period

JEL Classification: E25, J30, O50

(责任编辑：西 贝)